

传媒时代下的“大西南文学”生态与发展

——以近代四川（蜀）文学为例

李 琴^①

引 言

“大西南文学”是一个从区域空间角度提出的文学新命题。与“区域文化”相对的是国家性乃至“全球性文化”概念。就“中国”这一国家性区域而言，其内部文化是多层而丰富的，有庙堂/民间、精英/平民，也有正统/异端、前卫/保守之分。而这种区分正是依靠不同的区域空间文化加以表现。对区域文学的梳理与挖掘将有利于打破现代性的统一宏大叙事，呈现非“均质”性多样态的地域文学特点。这是研究“大西南文学”的意义所在。

近代以来，文学从口耳相传的时代进入公开的现代纸质传媒时期。纸质传媒（报刊为主）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公共平台。那么，“大西南文学”这一区域文化形态在传媒时代究竟处于怎样的生存状态，在新/旧与现代/传统的转换中表现出怎样独特的文化过程与生命思考？这既是对大西南文学在传媒时代到来之初其生态状况再现的目的，亦是对当下该区域文学如何在传媒化、全球化时代中发展的思考。现代传媒一方面为区域文学提供了时空压缩的地球村式的体验，同时也造成了区域文化的“结构性欠缺”感与“空间焦虑”问题。从行政地域而言，大西南应该包括云、贵、川以及西藏等。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传播路径是典型的“波浪式”传播方式，即新文化信息首先由文化中心或者话语权掌握者如北京、上海

^① 李琴，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等区域获取，而后再波浪似蔓延至如云贵川等这样的西南偏远之地。虽然现代传媒造成了各国家、地区、区域文化交往的同步性、等距性的体验幻觉，但是现实经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与差异性，又时时冲击着这种全球平等的幻觉。因此在谈及如“大西南文学”这样相对远离文化中心的区域文学时，我们总是试图追问该“区域文学”如何才能成为国家民族文化的中心，或者焦虑它距离文学中心场域究竟有多远，如何才能融进中心场域以及该如何保持自身区域文学的独特性？所以“空间焦虑”几乎就等同于落后/进步与边缘/中心这样的二元对立式和价值判断。“空间焦虑”的背后究其实质是话语权的焦虑。而在全球传媒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下，话语权的掌握与拥有与传媒是紧密相连的。日益发达的现代传媒、网络平台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全面展开，也极大改变了文化的传播繁殖方式与影响深远度。某种意义上，谁掌握了传媒，谁就拥有了传媒时代的话语权。这是本文之所以从传媒角度分析区域文学形态与生存环境的根本立足点。

就具体研究对象而言，本文以近代四川传媒与文学关系为考察中心。四川从行政、地域而言都隶属于“大西南”这一区域，是“大西南”之下的次级区域。它与“大西南”其他次级区域具有诸多共同点：如偏隅西南，是中国地势最高的区域，经济相较东南沿海落后，多民族聚居，文化驳杂，与中原正统文化相去较远。而另一方面四川文学在整个“大西南”中处于相对发达、繁荣的地位。它的特点与问题可能并不能涵盖整个大西南文学，但至少能部分反映整个大西南区域文学的症状尤其是问题或劣势。而选取“近代”这一时期，是试图追本溯源呈现传媒时代来临之初四川区域文学呈现出的部分“本源性”特征与症候。本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四川传媒发展与文学生态形成过程间关系的梳理与探究，全面观照近代四川文学的生态环境，展现四川区域文学由传统向现代嬗变过程中与文化中心话语之间互动而又偏离的过程。对无论是地理还是文化距离都较“偏远”的区域文学转换过程的尽力还原与具体化，亦正是对整齐划一的文学史书写的背叛。这是本文研究目的之一；而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应在全球传媒时代的当下，四川乃至大西南这样的区域文学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与机遇。

一、近代四川传媒的出现与文化异动

就区域文化传统而言，四川地区有着独特的内陆盆地文化特征。四川偏隅西南，远离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圣经贤传”、纲教礼常相对薄弱，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平坦富庶的成都平原为“川人”提供了相对宽松、富庶的生存环境，形成川人重生活实际和追求生活情趣的特点。以上种种，势必造成本地区相对保守、封闭、缺乏努力创新之激情的区域文化特征。然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困境又激发了川人冲出盆地，向外开拓的蛮力与勇气。

近代以来，因四川地区地处内陆腹地，缺乏近代经济基础，加之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敝，蜀无宁日。巴蜀大地笼罩在死气沉沉的阴云之中，对新学、西学的接受显得十分缓慢。而东南沿海、沿江地区已出现具有现代性的都市和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先锋式人物，如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对蜀地思想文化的这种封闭落后状态，我国近代著名经学家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曾谈道：“……蜀处奥壤，风气每后于东南，自中外互市，官局士夫，译刊西书，闲有流布，吾乡老宿，因宗教指其政治、舆地、兵械格致各学为异端……”^①

1898年5月5日，四川成都地区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创刊了。宋育仁、吴之英（伯杰）等任主编，初为半月刊，第四期后改旬刊，为蜀学会的机关报。自1898年到1919年，成都出现大大小小，或党派报或专业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大概几十上百种。如辛亥革命前后，有四川宪政会、法学研究会、保路同志会等立宪派主办的《蜀报》《蜀风杂志》《西顾报》《白话报》《启智画报》；民初，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天民报》《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四川民报》《寰一报》；共和党——进步党方面的报纸，《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日日新闻》《四川正报》《谏报》《西蜀新闻》《天声报》；另外还有如《川报》《成都日报》《成都快报》《国民公报》《四川旬报》《四川矿业杂志》《四川国学杂志》《四川官报》《四川学报》《四川政报》《启蒙通俗报》《长歌》《世界观》《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等报章杂志。

^① 《骈文读本序》，载《蜀报》（半月刊）第二期“文汇”。

这些报纸虽创刊于成都，但大多并不仅限于成都发行。如《蜀报》（半月刊）的分售处在成都有三处：志古堂、二酉山房和文伦书局，另外在北京、上海、重庆都有分售处。《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至第六期（民国三年十月二日）时代派处还仅限于成渝两地，第九期新增代派处上海四马路，到了第十期（民国三年十二月二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几乎遍布全国，北京、保定、天津、上海、苏州、绍兴、杭州、福建、汉口、长沙、河南、陕西、云南、贵阳……甚至在一个省市设有多个代售处，如在北京就有六处，天津则有四处。报刊的扩大发行有利于文学的公开传播，自然也为文学书籍的出版印刷提供了物质可能。

在尝试扩大外地影响的同时，蜀地报业在本地社会生活中日益显示出其舆论影响力。《蜀报》（周刊）第六期“说部”借小说人物孙民权之口描述了当时报业之盛况：“凡一报馆是各有各的宗旨，其大要总不外代表舆论、灌输文明、改良社会等语。近来中国的报馆几乎无处不有，报纸之发达可谓集一时之盛……现值民国初基，事务纷繁，兴革一切，端赖报纸。”《启蒙通俗报》“中西新闻”中也曾刊载一则“看报得大利”的小新闻：“有人因看报得到消息买了新译的书，在考试中得了第一，得奖银约百两。”

上述二例，是报纸通过小说和新闻报道方式为自身鼓与呼，不免有夸张之嫌，但“事务纷繁，兴革一切，端赖报纸”却亦道出了报纸与社会变革和舆论风向引导之间的密切关系。晚清以来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报纸通过它较为发达的发行网络与影响力和民众发生切实的关系，为以后文学借传媒在大众中传播奠定基础。

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

自1906年停开科举，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生存模式被迫改变。部分知识分子进入新兴报业，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职业化报人。做编辑，为报刊撰写文章逐渐成为这批知识分子重要的生存方式。在生存方式改变的同时，他们“自由报人”的身份日益突出并逐渐成为文化公共领域最初的建构者与引导人。细察成都地区这一时期报纸，就会发现各报刊逐渐聚集起了一批固定的撰稿人，如《蜀报》之朱山、吴虞、叶治钧、沈宗元、白坚、邓孝可等；《蜀风报》之愚公、詹言等；《娱闲录》之墨公、毋我、度

公、觉奴、畏尘女士，《女界报》主笔曾兰女士等。他们大多既是报刊撰稿人，同时也是报刊编辑、记者。譬如朱山，既是《蜀报》的总编辑，也常常在《蜀报》上发表诗词作品；吴虞是《蜀报》的编辑和撰稿人。曾兰女士既身担《女界报》编辑和主笔的双重身份，亦同时在《娱闲录》等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这些撰稿人中，有相当部分成为了该地区首批职业化的小说家，如《娱闲录》小说栏目的主撰稿人之一——觉奴。他同时在《娱闲录》及成都其他几家报刊如《国民公报》等发表小说作品，并结集出版。从专业撰稿人的出现到职业小说家的诞生，近代传媒悄然改变着传统文人士子的生存模式和文化心理。

近代报业的广泛传播，也培养了一群相应的“读报人”。“读者来信”的出现，正说明了文化传播链条的反馈端已形成。如《娱闲录》第五期开始设“读者来稿”栏目。类似栏目的设置意味着新文化生成、传播、接受、反馈系统的初步建立。随着读者圈的初步成型，报刊还吸引了部分“投稿人”。在《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上就出现了标明为“投稿”的文学作品，如第八期就有两篇为“投稿”作品：分别是小说《傅守中》、游戏文《饭桶小传》，另外同期还有两篇署名“来稿”的游戏文。文学来稿或投稿人的出现表明：借助于近代传媒这一现代传播载体，文学的创作与欣赏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或精英知识分子这一特定阶层或群体，普通市民亦可通过传媒这一公共文化平台参与并影响文学、文化事件或发展轨迹。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以上叙述仅是四川本地区传媒发展的线性历史勾勒。倘若将近代四川传媒置于全国范围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近代四川传媒之弱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传媒的事实。排除川人在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家创办的报刊，近代四川本土传媒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者可谓寥寥。而外地强势传媒却又无形中制约甚至压倒四川本地传媒。因此近代四川传媒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有限的，它为四川本土文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媒介形式和传播条件，但又似乎缺少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强大号召力与权威性。所以，四川人邹容被誉为“中国之《人权宣言》”的《革命军》未在四川而在上海出版；“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那篇著名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则通过《新青年》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檄文而声名远播。

二、公共领域的诞生与文学格局之雏形

翻开近代成都的各类报刊，扑面而来的是浓重的政治气息，国家之处境、政治体制之沿革、社会经济军事之现状，国际社会的发展和对中国之威胁，国民素质之优劣，精神思想种种之弊端，四川民生之各种状况……这与近代四川报刊多为党派报或机关报不无关系，政论或文化思想的宣传本是其办报主旨。报纸的栏目设置多为“论说”“时评”“纪事”“学海”等，其政论压倒式的优势再明显不过。

但如若报刊全部是如此内容，整张报纸难免显得过于坚硬、单调甚至枯燥无味。正如《启蒙通俗报》发刊词所言：“专以开通蒙俗为主”，则必须“无论何人均可一看”。蔡元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时曾提及：“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①可见，通俗易懂，生动有趣亦是报刊吸引普通读者的重要因素，而文学则是调节政论式报刊过于严肃呆板而又免于流俗的极好方式。创刊于1910年的《蜀风》（半月刊）不久即设置“文汇”栏目以专门刊载部分旧诗文。虽然这些“文学性”栏目最初多屈居报尾，并且数量少，内容也显得过于陈旧，但这一变动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文学”终于搭载上了近代“传媒”这艘时代大船，开启了新的历史航程。随着传媒的日渐成熟和文学本身重要性的凸现，报刊为文学留出了更多的空间，逐渐增加了“文苑”“艺林”“笔记”等栏目。而小说影响力的不断加强，也促使很多报刊增设“说部”栏目，为往日文人所不屑的边缘文学提供一席之地。

至此，文学已逐渐成为许多报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丰富报刊版面形象，吸引读者的同时，也为自身发展找寻到了全新的平台。需要指出的是，文学与非文学栏目的区分只是相对而言，非文学栏目的文章并非就此画地为牢，断然判断为非文学性作品。在“论说”“时评”等栏目中，很多文章本身仍然具有很强的文学意味，体现出政论文学化、新闻文学化的特点。这里各举一例，以为佐证。如《娱闲录》第二十二期刊出论说文《救国谭》（劫余著）：“……今者之国之祸迫于眉睫，而救亡之声震于

①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9页。

耳鼓矣……凡有血气孰甘忍受,而爱国之士忧辱……谓坐视而亡毋宁一战而亡,犹不失为豪杰之败。”黍离之痛,慷慨悲歌。今日读来,仍是声震于耳,热血沸腾。《蜀报》(半月刊)第三期“外国纪事”中则有两则以故事形式讲述的新闻:一是报道英皇携皇后到伦敦城东贫民区,街道两旁无警卫,百姓还大呼欢迎,彰显出英国君民间感情之融洽。另一则是宣传德皇之俭德作风。两则新闻以朋友间讲故事的方式叙述,轻松自然,一去模式化新闻的枯燥无味。

随着近代传媒搭建起的最初文化公共空间,四川文学与其相因相生,文学格局之雏形渐显,呈现出以下几大特征。

1. 译介文学的滞后

报刊设立专门文学栏目后,除了刊载本土文学作品外,还逐渐开始引入部分川外文学作品,其中即包括域外小说的译介。当时译介作品较多的是《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其译介作品包括母我口译、觉奴笔述的《严窟王》(法国岳珂著)(第一期),印度神话《刺玛王》(第二期);丹君述意、纯浩润文的社会小说《白衣妇人》(第五期),慕玉女士述意、雪岑陈庚润词的《情海钟声》(第十七期)等。这些作品译介过程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意译而非直译;第二,非单人独立完成,而是由两人共同完成。一人翻译述意,一人润文,经过了由书面语(域外)到口语(本土)再到书面文字(本土)的过程。这一特殊的译介引进过程也正是当时中国翻译界的时代风尚。

中国文学界对域外小说的大量翻译引进约在戊戌变法前后。据粗略统计,1906至1908这三年为晚清翻译小说出版的高峰,分别为105种、135种和94种,大致等于同时期创作小说的两倍。^①但这种译介作品大于本土创作的情形,在近代四川文学表现得并不明显,而且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四川地区对域外小说的引进都远远逊色于国内北京、江浙、上海等地。作为近代四川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副刊《娱闲录》,翻译介绍域外小说在同时期四川报刊中应是最多的,但每期数量也基本维持在1至3部,四川地区其他报刊每期登载的域外小说则在一部左右,甚

^① 参看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第32页。

至长期没有域外小说的引进。而就翻译作品的选择而言,出现在四川地区刊物上的往往是二三流的作品,甚少一流经典名著。截至《娱闲录》创刊的1914年,全国范围内已出版的世界小说名著已有18部之多^①。而这其中无一部为川人翻译刊行。另外,随着翻译行业的日渐兴起,国内出现了一批以出版发售域外小说的书局,比如商务印书馆和小说林社。相对于国内出版界的新转向,川内的出版界也显示出某种滞后性。虽然这时也有像昌福公司出版发售域外小说,如《福尔摩斯案》,但数量甚少。此时,四川出版界的发售工作仍主要集中在国内和四川本土作品上,如当时影响甚大、流行甚广的《孽海花》、绘图《老残游记》等。另外还发售了一系列的传统文学作品,如绘图本的《牡丹亭》《桃花扇》等,另外如觉奴发表在《娱闲录》上的小说也通过昌福公司再次结集出版。

外来文学引进的相对稀少,加之对本土文学的固守,势必会影响川内文学的视野和发展,造成内部循环、内部消耗状态,致使川内文学的自身生长性不足。

2. 雅俗之变

雅与俗之判断,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往往约定俗成,从文体、体裁、读者乃至艺术风格都可以此标准进行划分。“俗大体包括‘通俗’(大众化)与‘鄙俗’两个层面。如果落实到文学中,前者指可见的外在的形式特征(如写作章回小说、采用白话),后者则指作品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不论文白,也不论章回小说还是正统的诗文)。只是由于士大夫的偏见,形式特征的‘俗’被无条件地等同起来……”^②因此,小说始终徘徊在中国文学的边缘,成为俗文学的代表。而诗歌则长期居于正统文化中心,成为雅文学的代表。

近代四川报刊栏目最初的编排正可见出雅俗文学的等级之分。首先,报刊如若登载文学作品,诗歌必有,其他类型的文学作品则可阙如。《蜀报》(半月刊)一卷前几期即如此。倘若各种文学样式同时出现,诗歌居于文学版面首位。栏目顺序大致为:“文苑”(或“文汇”)、“杂俎”“艺

^① 参看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页,第32页。

^②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林”“说部”，诗歌置于“文苑”，小说归于“说部”。其时，《蜀报》（周刊）、《蜀风报》《世界观》等报刊大都依此顺序。

相较于国内早已风起云涌的“诗界革命”，此时刊载于四川报纸上的诗歌仍依旧体，包括律诗、绝句、词，内容大致是唱和、悼亡、怀古、感时之类，不脱旧例。这些诗歌中，多乡贤遗老的旧诗抄，如《蜀报》（半月刊）第一年第二期“文汇”中富顺刘光第之作《哀圣齐遗文》《哀圣齐遗诗》等，颇有些“故纸堆”气息。间或有当代新知哀民生之多艰、慷慨涕泪的感时之作，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作品，如署名“神豪”的《感时》二首（《蜀报》第六期“文苑”）。此二首诗虽切合时事，但无论体例还是用典都还是旧诗文的传统。“诗歌”也是最早在四川近代报刊上为作品结集出版做广告的文类。如《蜀报》（半月刊）第四期就曾登载过四川存古学堂选刻的广告：“国朝蜀人诗集凡先辈遗篇、当今巨制，无论先刻未刻并乞将原稿径送敝堂。”

从四川各报刊对诗歌编排位置的重视，以及对诗歌出版的热情，旧文学传统在四川仍然具有强大的绵延性。但这种诗歌居首，小说殿后的格局在文艺副刊《娱闲录》中得以改观，诗文之变悄然发生。

《娱闲录》中，“小说”被放在了所有栏目的第二位，仅次于“插画”，诗歌则仅在“剧本”栏目之前，列于倒数第二位。“插画”以其形象直观之便利，而位列“娱闲”之首，似当之无愧。但就文学样式而言，“小说”则在众文体前列，“诗歌”倒有忝列末位的意味。而《娱闲录》上小说种类之丰富，数量之多已远非诗歌可比。就范围而言，中国小说居多，同时译介异域小说；从体例上看，短、长篇兼有。长篇沿用章回体形式，但也有抛开此种形式，直接依故事发展分章节的。短篇则形式松散自由些；从题材上看，时事小说、教育小说、谴责小说、滑稽小说、哀情小说、侠情小说、历史小说、传记小说等诸类都有，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出现的所有小说种类；就数量而言，从第一期的四篇小说，发展到后来每期十篇以上的规模。“小说”这一曾经边缘、不入流的俗文学一时间急剧膨胀，大有泛滥之势。陶祐曾就当时中国之小说情状有一精彩而生动的概括：“二十世纪，有一大怪物焉：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不扣而鸣；刺人脑球，惊人眼帘，畅人意界，增人智力；忽而庄，忽而谐，忽而歌，忽而哭，忽而激，忽而动，忽而讽，忽而嘲；郁郁葱葱，兀兀屹屹；热度骤跻极点，电光万

丈，魔力千钧，由无量不可思议之大势力，于文学界中方以异彩，标一特色。此何物欤？则小说是。”^①这一段话用以考察《四川公报》副刊《娱闲录》上“小说”发展态势似乎也甚为恰当。

在结集出版方面，从诗集的最先刊行至小说的大量销售亦发生在短短几年时间之中。小说（集）明码实价，大量刊行，且刊物的广告也大多是小说出版的消息，多时一期就有六七部，大有压倒诗歌的趋势。

除了小说地位的急剧上升，其他一些俗文学如游戏文、劝世文、打油诗等文体也开始崭露头角。这类文章多置于“杂俎”“论说”或“艺林”等栏目中，如《蜀报》（周刊）第六期“杂俎”中署名“商隐”的《莫可奈何》，宗周的《戏论假斯文》，《蜀风报》第三期第三册“艺林”中的《衣架致饭桶书》，《启蒙通俗报》第六期“论说”中的《醒世劝俗文前后篇》，《启蒙通俗报》第十六期“启蒙类”中新樵所作《劝游学歌》等，都是颇有影响的游戏劝世文。作为专门的文艺副刊《娱闲录》还辟出“游戏文”一栏，每期刊载数篇此类文章。这些游戏文、劝世文、打油诗，文字五花八门，或正话反说，或滑稽讽刺，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民风吏治日益坏则游戏文章日益多，而报纸之价值日益高则阅者之心日益切，而流行者日益广。”^②正如李欧梵所言，这类文章的出现，既能为报业带来商业利益，同时其批评也能在文化层面上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而在文学上，其或反讽戏谑或通俗晓畅之文风无疑在森严的传统文学中撞开了一条裂缝，成为后世白话诗文的先期试验田。

由于当时四川境内川剧兴盛，也促进了另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剧本写作，但主要集中于传统戏剧尤其是本土剧种——川剧。《娱闲录》早期的“名优名妓”栏目，后来的“剧谈”“剧本”“梨园丛录”“艺坛片影”等栏目，都为这类戏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同时也为西剧的进入奠定了一定基础。在《娱闲录》上就陆续出现了如喜剧《情中正》《黄金塔》等脚本，并配有春柳社成员出演《黄金塔》的剧照。在小说开始大

① 陶祐曾：《论小说之实力及其影响》，转引之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的重新评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28页。

②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5页。

量出版的稍后一段时间，剧本也开始出版发行，如在《娱闲录》第十七期就同时推出了五个新剧本：《洗耳记》《烟民镜》《骂卓》《情中正》《负薪记》。新剧本的发行销售，同时带动了前人旧作的重新出版，如绘图的《牡丹亭》《桃花扇》等。

近代四川地区文学的诗文代变，已是不争的事实。雅俗文化趣味、审美精神之变迁，既是时代之风尚，也透露出川内文化重日常生活，追求闲适情趣传统的内在制约性。

三、文学副刊的出现与文学趣味的培养

1914年7月，《四川公报》特别增刊《娱闲录》创刊。《娱闲录》一出，影响所及包括报刊本身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成都文化的繁荣。成都老报人孙少荆曾撰文回忆：“樊君（*樊孔周）并于民国3年将公报增刊一种文艺杂志，名《娱闲录》，每月发行两册。当时的小说和游戏文章，果然轰动一时。《四川公报》势力，也受的益处不少。这《娱闲录》发行时代，又算得是文人得志时代。只要知道当时成都事情的人，哪个不晓得吴爱智……李老懒……这几位记者先生，因为这《娱闲录》是他们办的俱乐部样。”^①

自然，《娱闲录》之于四川文学的发展是起至关重要的。它的出现，意味着近代四川传媒终于诞生了首个专门的文艺副刊，也标志着近代四川文学进入相对成熟与稳定的发展期。

以传媒为载体，文学的发展必然会受限于载体本身的特性；除此，政治权力话语之“言禁”、读者文化趣味选择亦会干扰文学的发展路径。如何在重重网罗之中争得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并且能够有一定的物质利益支撑，这是摆在众多报刊面前的多重生存难题。《娱闲录》第一期饶有意味地以一篇名为“读者来信”的文章作为发刊词：“言禁之密……则诸公之为是录，度其中必有至不获己之苦，有万非正言庄论所能曲达者，盖不但游戏于斯文而苟以自悦己也。”辛亥革命之后，现代传媒发展曾有一段

^① 孙少荆：《1919年以前的成都报刊》。

“黄金时间”。但好景不长,“黄金时代”很快过去。《民国暂行报律》的颁布预示了这一变化的开始。之后,封捕报人的事件屡有发生。1912年一年内,仅四川境内就有《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等报纸被查封或捣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罪名斩首于成都皇城的摩河池畔。^①

此时四川文学亦已基本完成诗文代变,而避开政治意识之锋芒,“游戏于斯文而苟以自悦己”的雅俗共赏、大俗大雅,甚至庸常低俗的文学成为部分传媒文学的选择。《娱闲录》即诞生于此历史语境之中。纵观《娱闲录》,其办刊思路与审美取向上的市民性、趣味性和娱乐性倾向是比较明显的。

《娱闲录》的栏目成型经历了一个从零乱芜杂到整齐统一的过程。第一期《娱闲录》列出的栏目有十一种之多,分别是“杂说”“益智集”“异闻录”“笔记”“小说”“谐藪”“名优”“名妓”“杂俎”“文苑”“剧本”。第二期又加入“趣谈”,第三期增加“游戏文”“名胜志”等栏目。栏目数量不断增加,但却显得过于细化甚至琐屑。有限的版面,栏目过多,势必造成栏目内容的浅尝辄止,而读者亦是浮光掠影。从《娱闲录》初期栏目设置的变动,正可见出刊物对自身文化定位与发展方向的模糊与不确定性。至第五期左右,《娱闲录》的栏目才大致固定下来。凡以图片为主的栏目如“名优名妓”“名胜录”等都归入“插画”。除“插画”外,《娱闲录》基本按照文学文类设置其栏目,分别是:小说、游戏文、剧谈、杂俎、文苑、剧本等,初步体现了它作为文艺副刊的基本特色。栏目位置的固定和版块化,意味着《娱闲录》办刊思路的日渐成熟和自身审美趣味的风格化。另外,《娱闲录》也会不定期增开如世界珍藏、梨园丛录、艺坛片影等非固定栏目。在栏目基本格局稳定后,适当加入一些新栏目,就不会再造成刊物的杂乱不堪,反而能起到新鲜多元的效果。

在栏目设置上,《娱闲录》将“插画”列于众栏目之首,这在四川其他报刊上是未曾有过的,倒是有不少报刊将“插画”置于所有文学样式之后,如《世界观》杂志;有的报刊则根本未设置此类栏目,比如《蜀报》《蜀风报》《启蒙通俗报》等。《娱闲录》上的插画数量一般每期5幅以上,

^①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82—685页。

与其他栏目所占比重不相上下。图片无论中外、人物或风景,比如第五期就介绍了欧洲名画《几俄昆多之微笑》(即《蒙娜丽莎的微笑》),并配有文字介绍。另外像名胜古迹之类的图片也较多,如成都的百花潭公园、驷马桥、商业场,北京的颐和园、故宫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插画中有关“名优名妓”尤其是川内戏剧名角的照片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四川戏剧业(以川剧为主)一时发达,民间演戏看戏之风盛。因此《娱闲录》图文并茂,将名角本人的照片和介绍文字同时刊出,如名震一时的谭鑫培、谭芸仙等都被如此隆重地介绍过。名妓照片也如法炮制,甚至中外一概囊括。另外“插画”还常登载一些诸如西洋夫妇爱情写真图等日常生活照片。《娱闲录》对“插画”栏目的重视,正可见出该文艺副刊为追求直观易懂,娱乐休闲之效果,满足普通读者阅读要求所作出的努力和调整。

《娱闲录》还很注意通过画图增加栏目的可看性和各栏目间的风格统一。《娱闲录》每期单独发行,有专门的彩色封面,以中外人物生活化的图景为主,或是绅士名媛款步而行,或是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喃喃自语,总之风土人情,一派闲适。另外《娱闲录》各栏目名称旁往往都有配图,图片风格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西式人物、漫画式构图居多,在有效整合副刊艺术风格的同时,亦给人以新奇怪诞之感。

像益智集、异闻录、名胜录、世界珍藏等栏目的开辟,则明显是为了增添《娱闲录》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益智集”主要介绍新近的科技小知识,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诸如第一期中“男女感情试验器”的介绍;“名胜录”则是宣传介绍各地之名胜古迹。而在第十二期“新年号”中,《娱闲录》则详尽介绍了各国新年的风俗习惯、游戏娱乐方式,像外国的“打球”“风琴唱谈”“盘球”(即今天的台球)等游戏都有图片说明。

就《娱闲录》的主体——文学部分,既有对时代文学大潮的跟随,亦时时透露出四川区域文化的特色与制约。

上文曾谈到近代以来诸如游戏文章、打油诗,小说等文学样式逐渐从未流或不入流而渐渐跻身于文学主流大军之中。一方面,文学内部各文体随时代变化而消长是变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文学文体与国民启蒙之关系,启蒙之“开眼世界”的内在需求与传媒之间的联动关系,亦是导致此变化的关键性因素。自然,报刊尤其如《娱闲录》这样的文艺副刊在栏目安排上将小说、游戏文等栏目前置,而诗歌殿后的用心则有推波助澜之

功。反之，报刊传媒本身洞悉了文学市场这一内在演变，抓住最有读者市场的文学样式，亦即抓住了巨大的读者市场。《娱闲录》既是最早将“诗文代变”明确体现于近代传媒之上的四川文艺刊物，亦是有效利用传媒将新兴文学观念进行传播的杂志。

《娱闲录》不仅将“小说”置于最显耀的主体位置，且小说数量可观，体裁和题材方面更是远较其他文体丰富。《娱闲录》的小说以短篇为多，每期数量约八篇左右，甚至十篇，长篇则为二至三篇。这些小说中包含了大量的“鸳鸯蝴蝶派”似的小说。单举以“情”命名的小说就有若干种：艳情小说（如觉奴著《爱》），哀情小说（如觉奴著《梦昙情话》），侠情小说（如定水著《义妓》），言情小说（如我闻著《秦淮恨》），奇情小说（如觉奴著《负心郎》）；这些小说以其浅近易懂的文字讲述着或通俗或戏谑或讽刺或欲望之宣泄的时代故事、家长里短、爱恨情仇。从刊物对短小精悍的短篇小说的青睐和大量新旧夹杂的通俗故事的选取，不难看出杂志对文化定位——针对有闲阶层的文学趣味，同时满足了普通市民对通俗文学的渴求。

对四川本土戏剧界（旧戏）的关注是《娱闲录》的一大特色。除“剧谈”“剧本”两个栏目是对戏剧本身的关注外，其他与戏剧相关的栏目均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和鄙俗化倾向。从最开始的“名优名妓”到“梨园丛录”“艺坛片影”等栏目的开设，刊物为讨得大众喜欢而有意识地迎合部分市民的文化趣味，可谓用心良苦。譬如“梨园丛录”，专门刊载名优小传和赏戏观人之感想，以及赠与各名角的酬唱应和之作。这与当时四川演戏看戏之风盛，“名人雅士”捧戏养戏之风炽不无关系。《娱闲录》抓住了四川文化闲适享乐、安于现世的特点，以赢取更大的读者市场，其实《娱闲录》也正是四川区域文化的一大表征。

与此同时，以传媒为载体的《娱闲录》亦面临着维持传媒本身商业运转的难题。

报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在近代四川很多报纸的第一版或最后的广告页上，都会看到或是报纸捐资者名单，或是召集捐资者。某些报纸因资金困难，或印刷成本增加而直接在报刊上催缴订报费。《娱闲录》作为文艺副刊，单独发行，更加面临如何维持运营的难题。为了吸引读者，《娱闲录》开始注重对自身的宣传。第十九期上，它

就登出广告：“从第十八期起刊出的欧洲大战争写实系友人新自伦敦寄来者，为我国所仅见。并特请觉奴、毋我两君长篇小说加多字数，改用五号字排印；短篇尤为精心结撰……”“写实”为国内所仅见，强调刊物内容的“独家性”；而长篇小说缩小字号加大容量，短篇“精心结撰”，则是试图向读者表明该刊内容的“货真价实”乃至“物超所值”。除了给刊物本身做广告，《娱闲录》还辟出多篇彩页专门为自家发行公司——昌福公司做广告，推销其出版的各类书籍。另外《娱闲录》上亦有不少纯商业性广告，譬如十二期上因利织布厂的广告，十三期资生牛乳厂的广告。彼时，报刊的发展资金除了募捐外，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这种纯商业性广告收入。所以，传媒在供给文学越来越广阔的公共传播领域的同时，传媒自身的运行逻辑亦影响改变着文学的生存环境与发展路径。

《娱闲录》中当然不乏“正言庄论”不得不付与“曲笔”之作，或是关涉民生时艰的文章，譬如李劫人署名“李老懒”发表的《做人难》，曾兰女士的《孽缘》等，也有介绍文学新动向的文字，如四川人曾孝谷的现代话剧演出等。但从栏目设置到具体内容，大多还是契合了《娱闲录》之“娱闲”要意——怪谈异趣、消闲娱乐。文艺副刊以如此面目出现，不难看出传媒文学对当地普通百姓、有闲人士文学、文化趣味的有意迎合。

余 论

近代四川传媒与文学发展互动历史的梳理，给我们留下了以下几点思考与启示。

第一，传媒水平、影响力以及传媒对文化话语权的掌握、引导与文学影响力的关系。

为什么四川地区会出现“蜀中才子蜀外扬”的现象？抑或者在“蜀外”也“不扬”？何以相似的文学实绩其影响力却是天壤之别？譬如白话新诗的创作。四川近现代诗人兼音乐教育家叶伯和曾出版白话新诗集《诗歌集》。叶伯和尝试创作白话新诗的时间可以追溯至1916年以前，而《诗歌集》于1920年5月由上海华东印刷所出版。胡适的《尝试集》创作始于1916年7月，至1917年9月集成一小册子，1920年3月正式出版。从

创作、出版时间早晚而言，叶伯和并不比胡适晚，甚至可能更早，但论诗集的“文学史”价值，一个籍籍无名，一个则是被公认的白话新诗集“第一集”。类似情形还有曾兰女士。曾兰，吴虞之妻，是四川第一张妇女报纸《女界报》主笔，同时也是《娱闲录》重要撰稿人，中国南社社员。她也是成都最早接受新文化洗礼的新女性。她曾在《女界报》发刊词中写道：“吾辈自当一扫从来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卑鄙污贱之戮辱桎梏，发愤而起，以光复神圣之女权。”也曾全面介绍并翻译了妇女问题研究经典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将风靡世界的《女权宣言》翻译为白话。同时她早在1912就提出了要“广为扶持传播”现代白话文的主张，认为这是“大有益于国家社会”，“也就是中华民国前途的大幸事”。^①曾兰女士曾在《娱闲录》首发过唯一一篇白话文短篇小说——《孽缘》，该小说后又于1915年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六卷第十号。曾兰通过小说女主人公鲁惠在“腐败黑暗的家庭”的不幸命运，揭示了专制制度下妇女的悲惨境遇；也通过作品中其他女性的言行，批评了妇女自身的缺陷。时任《小说月报》编辑恽铁樵在与曾兰女士的信中评价该小说“叙事明晰，用笔犀利，甚佩甚佩！”同为女性作家的白话小说创作，陈衡哲白话小说处女作《一日》于1917年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胡适评价其为“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而在之后的新文学史书写中，该小说亦被认定为“女性白话小说第一篇”，而曾兰的小说却默默无闻。

如此情形，不独上述二例，也不独四川。由此不难见出，传媒的传播繁殖能力和对话语权的掌握以及何人掌握等，都是文学影响力制造上不可小觑的因素。

第二，传媒的审美品位、文化趣味选择，影响制约着与其相因相生的区域文学发展路径。若以四川极具代表性的《娱闲录》与稍晚一年左右创刊的《新青年》相较，四川区域文学与文化中心话语之间的分野是极其明显的。而这种区别，在当下的四川文学中仍然有迹可循。以近代传媒为载体的四川文学传播日趋化俗、趋俗甚至媚俗的走向，对传媒和文学都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化俗、趋俗可能为传媒和文学两者同时赢得更大的阅读圈子，从而拉近传媒与大众，文学与大众的距离。国计民生的思考

① 曾兰：《今语有益于教育论》，《女界报》，1912年。

固然重要，但这主要集中在有志之士和学生群体，普通百姓、市民在这一公共领域中则趋于沉默。但他们无论是作为巨大的读者市场，抑或是作为“移风易俗”的重点对象，都要求传媒、文学创作重视与满足他们对通俗文学、文化的需求。自然，传媒如果一味为娱人而“娱己”，为取悦大众而牺牲文学的文化品质，也必然会殃及自身的良性循环机制，最终导致传媒影响力的下降。

所以，当作为文化事业的文学遭遇文化产业的传媒，如何协调发展、良性循环，这是传媒时代文学面临的关键问题。

第三，区域文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可能与文学中心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背离或相悖。

“感时忧国”是自近代以来文学文化的核心话语，围绕于此的是现代理性启蒙话题，国民性问题、民族问题等历史宏大主题。而日常世俗、市民趣味的民间钩沉则因与“新文化”主旨相去较远而被漠视、边缘化甚至被批判。这恐怕是近现代以来四川文学诸多作家作品被忽视、忽略的原因之一。

那么，区域文学如何在作品中将具有独特价值的民间文化和普世价值和谐融合，也应成为区域文学发展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以上三点，既是对四川文学与传媒的思考，亦是对当下“大西南文学”这样的区域性文学发展路径的思考。